

历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李红岩

历史学的实证性主要体现在对史料的依赖上。没有史料即没有历史学。历史研究处于史料的先天限制之下。史料既限制历史重现,也让已逝的历史重新出场。史家通过史料打开真实的历史世界,为史料提供定位与构思,反向填充信息,让史料澄明起来,实现历史现场的情景再现。史料是历史编纂活动的第一环节。历史阐释首先体现在史料释证阶段,以揭示史料所蕴含的共同性与公共性为旨归。展望未来,史料的浩繁将导致垃圾与无用史料极度增长,故今人当怎样留存史料,会成为史家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为此,必须寻求面向未来的史料存留之道。

[关键词]史料;历史学;历史阐释;史料存留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4)01-0006-09

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2488)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历史学的实证性主要体现在对史料的依赖上。尽管历史学并不就是史料学,但没有史料却没有历史学。因此,古往今来,无论中外,凡历史学家,无不重视史料,历史学与史料的关系亦因之而得到理论上的严格检视。进入20世纪后,理论界将史学与史料的关系置于哲学高度进行探究,极大地扩展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空间。由于史料与历史一样具有历史性,故而不同时期对史料的认识也不同。那么,在21世纪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人类对史料的认识是否就完全充分了呢?史料是否还具有传统史科学所揭示的那些意义?特别是对于当代史料存留的规范与制度构建,是否已经变得没有必要,或者相关认识已经十分清晰完善?对此,很有必要从思想认识入手予以探讨,以便为未来的人们研究今日历史奠定史料根基,预先免除后人研究今日历史时的史料缺憾。

一、史家对史料的主体介入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P669)]这个著名论断乃是针对客观历史而言,并非针对史学而言,但是,它却具有重大的史学理论意义。也就是

说,历史学家书写历史同样必须“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去进行。所谓“条件”,就是前提,或曰限制,当然也是基础。它表明,历史研究必然在某种先天性的限制之下、基础之上才能进行。

这种先天性的限制与基础,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即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的总和。换言之,历史研究伊始即已被置于前定与既有的先见或前见之下。^{[2](P356-357)}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东西,也就是历史阐释学所说的历史流传物,其中最突显的是考古遗存与传世文献,统称为史料。

如此一来,史料便天然地有了某种确定的方法含义。^{[3](P84-85)}这种含义具有相反相成的二重属性。一来,它会限制历史重现;二来,它会让已逝的历史重新出场。面对具有如此两面性的史料,史家既要接受它的约束和限制,又要通过它来打开真实的历史世界。

当史料约束和限制史家的时候,它在遮蔽历史。而当它向史家传送信息的时候,则让历史现形。因此,史料在约束、限制、基础、通道、中介、载体、显现、照面、连接等多重面向与功能转化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作为历史在现实中继续照面的载体,史料占有历史,但无法自行将历史完整展露出来。它对历史的占有首先体现为门锁形式,而阅读与理解不仅是打开这道门锁的手段,还是史料自身释开放开放性、复活历史、使历史语境化、让过去与现在融通起来的实现形式。所以,伽达默尔说,史料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一直依赖于新的同化(Aneignung)和阐释。^{[2](P513)}

很显然,只有在新的同化与阐释中,历史才能连续不断地出场,也才能有所谓史学史的存在。但是,这种促使历史在同化与阐释中出场的东西,并不是历史本身,也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物理世界,而是如卡西尔所说,是一个符号宇宙,即由各种符号组成的世界。^{[4](P195)}换言之,它是一种人类主体表现的外化形式。因此,它已经历构形,因此不再是历史本身,客观历史只是在这种业已被构形的东西中蜿蜒曲折地显露真容。这样一来,史料便内在地既反映历史,又扭曲历史、遮蔽历史。由此出发,史料便会迫使史家既通过它去写实(realistic),又通过它去进行新的塑形(formative)。史家既要搜集它,又要辨析它,还得串联并解释它,从而使得自己既是被动方又是主动方,既是记录者又是组织者,最终成为新同化与新阐释的创造者。^{[5](P78)}为此,史家必须制定出一套相关工作的规程或条例。

于是,事情便发生了翻转。也就是说,史料给史家提供素材,史家却给史料提供定位与构思。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史家在阅读史料的时候,绝非仅仅被动地在感性直观的范围内接受史料中的信息,而是伴随着解读、体验、理解、认知、重构等一系列知性与理性行为。因此,史料信息的展露也就绝非史料的单纯招供,而是添加、掺杂了史家的反向填充。这种反向填充的过程,也就是对史料的理解过程。它的本性与内在要求,不是对史料字面信息的全盘接受,而是在接受的过程中进行重新创造。所以,伽达默尔说:“所有理解性的阅读始终是一种再创造和解释。”^{[2](P211)}我们会发现,凡大历史学家都有一个本领,就是在同样的史料中能够见人之所未见,从而令人拍案称奇。这种近乎“化境”的史料阅读本领,实质上反向揭示了史料的表层与深层结构,从字面意义进入史料的深层暗码驻所,因此是一种“再创造”,也就是达到了对史料的真正理解。

然而,历史学家的这种“再创造”是合理的吗?他所制定的规程或条例是否具有科学的理据?倘若不合理,为什么具有高度理性的学界同仁会予以认可?倘若合理,为什么在认识论上又缺乏圆融性的说明?对此,我们只能回到最基本的层面来加以探讨。

所谓最基本的层面,当然也就是阅读的层面。阅读具有建构意义的属性。伽达默尔说:“阅读本身已经是对所意指的东西的解释。这样阅读就是一切意义进程的共同基本结构。”“我们所阅读

的一切文本都只有在理解中才能得到实现。而被阅读的文本也将经验到一种存在增长,正是这种存在增长才给予作品以完全的当代性(Gegenwärtigkeit)。”^{[6](P26)}换句话说,在阅读史料的时候,史家不但在接受信息,还在扩展、增加信息。特别是当阅读残破史料的时候,史家不但参与到了史料释放自身意义的进程当中,还因此成了史料意义释放过程当中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由于史料与史家的双向互动,才使得史料不再是一种僵死固化的东西,而是能够增长,并与史家所在的现实社会衔接、呼应、唱和起来。就上述意义而言,“史家”同样被置于“史料”的概念之内。作为“史料”的“史家”所发挥的作用,是让史料澄明起来,并让历史的现场实现情景再现。

因此,历史的现实化与表现化,是史料与史家合作对话的结果。在史家与史料通过阅读而照面的对话过程中,首先达成理解(即相互说服),然后形成历史认识。历史认识的形成,是史家与史料讨价还价(inter)的结果。所以,理解史料先于认识历史。“所有的认识、认识中的证明以及证据的来源即史料等等之类的东西,恰好从来都是以理解为其前提条件的。”^{[7](P405)}从对史料的感性直观到形成对历史的认识,均通过对史料的解读得以实施与实现。这样一来,对历史的认识与阐释,便成了理解史料、实现史料功能的达成方式。历史认识与历史阐释通过文本写作传达出来、转达出去。由此,史料的基础性、决定性,对史家的召唤性与开放性,得到充分彰显。

总之,无论我们怎样充分地去阐发、揭示史料的主观性要素,都无法否认史料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塑形作用,因而也就无法否认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的基本属性。历史阐释的基本规定,即来自史料对它的约束。即使将史学文本指为单纯文学创作的最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也无法排除史料的前提性与基础性。因此,史料实为维护历史客观意义的首要力量。当然,以往那种单纯地以经验主义立场和方法看待处理史料的做法,已经不能应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从制作与留存史料的目的来说,必须看到,自远古到如今,差异甚大。史学史上的所谓“时代”,大体上均具有标识史料特性的含义。傅斯年说:“客观史学方法,非历史初年产物,而为后起之事,大概每一个民族历史的发展,最初都是神话与古史不分,其次便是故事与史实的混合,经过此二阶段后,历史乃有单独的发展。如希腊古史之记载,最初亦与神话传说混合。”^{[8](P159)}杨向奎说:“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时代,是原始社会,历史人物,只见于传说,或者说这是‘史诗’时代,历史存在于神、巫口中,还没有出现史书。”^{[9](P321)}诸如此类的见解,已是史学史上的常识。换言之,史料的出现非但不是客观思想的产物,反倒是人类主观愿望的宣示。史家对史料的主体介入,既要遵循历史主义原则,照顾到古人的意愿,还须尽力还原其客观性的内容,从而保证史料的可靠性。因此,它不是一种需要克服的东西,而是一种必须积极而科学地加以运用的力量。

二、史料与史家的释证过程

理解总是存在以误解为核心变量的变式。对于史料的理解,同样如此。因此,对于史家理解、认识史料过程中的思维结构,还须进行更深更细的分析,这样才能最终确证史料的客观性。

在西方学者的论述中,“史料”常以“文献”“痕迹”“遗物”“残留物”“证据”“见证”“证词”等二级名称出现。换言之,史料的范围极其广泛,未可强分畛域。钱锺书说:“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岂特六经而已哉。”^{[10](P266)}也就是说,在通识者眼里,凡是以往的痕迹,皆可视为史料。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史料的价值都是同等的。事实上,不同属性与类别的史料具有差别极大的功用,需要对之采取不同的态度与解读方法。例如“档案史料”与“文学作品”,虽均可视为史料,但二者的功能与范围显然不同。对此,史学理论界并未给予精准的

认识论分析,以至在史料划分上难免有类别而无伦品,亦即缺乏对不同史料的质的规定性的清晰界别解说。

当然,不论史料内部类别的成分多么复杂,它们都必然具有史料的一般性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体现在历史编纂过程当中,即如保罗·利科所说,使得史料成为历史编纂活动的第一个环节。从这个环节出发,才会有阐释和理解的第二环节。最后,则是以文字表象历史的第三环节。换言之,史料不是死的。从查阅它,到形成证据,史料所内在的积极的活的因素,都会通过史家的阐释(具体说是诠释)活动而表现出来。因此,“诠释隐含在历史编纂活动所有环节”^{[11](P462、P465)}但是,这是一种基于证据解释的诠释,绝非艺术化的完全创造性的阐释。^①因为,“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12](P10)}。一方面,“正是通过解释,文献成为证据”^{[11](P240)};另一方面,没有文献也就形不成解释。就证据或曰史料的作用而言,历史学可视为通过释证而对历史进行理解和阐释的学问。^{[13](P533、P535)}

很明显,所谓历史阐释或诠释、解释,无非就是史料在不同的层面开显、释放,被阅读、理解、释证、称述、共享。尽管“阐释”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具有元概念的属性,阐释学规则规定着历史研究的基本程序,但须承认,阐释属性毕竟在历史研究的史料释证阶段发挥起始与奠基作用。对此,既需要从文献学、史料学层面揭示,也需要从复杂的精神活动层面加以探讨。总体看,史学界在后一个方面的努力还不够。

作为鉴别性地重建史实的开端,“释证”是一个复杂的精神活动过程。释证过程中的理解、认识,包含着判别、去蔽。但是,历史从来不以话语之外的形式显露自己。因此,搜集史料作为释证行为的启动,一上来便让史家处于复杂甚至尴尬的境地。正如布莱德雷所说:“我们到处去寻找,但是哪里都找不到我们要寻求的对象;反而我们却看到了一大堆吵吵闹闹的证人、各式各样的叙述、一大堆毫不连贯的乱糟糟的证词、混乱一团毫不相干又大相径庭的说法;然而当所有这些都毫无可能被认为是真相时,其中却又没有一项可以认为是虚假的而加以摒弃。”^{[14](P13)}换言之,在“释证”伊始,所“释”的“证”便出了问题。这是每位史家都有的体验,因而是史料学的常识,却也是彰显历史学魅力的根源所在。这个时候,“史料”作为并不得心应手的工具,就如同转述神旨的赫耳墨斯(Hermes),非但不使本尊现身,还充满隐喻和暗示,将史家至于迷茫与疑惑之中。史家需要传达史料中的确切信息,但是他对史料的理解却一开始便被置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因而使得他的理解难免误解而滋歧解。

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史料制作与留存者的意图造成的。这些意图,或是有意植入,或是无意留存;或为阅读所需,或为阅读所忌,总之并不单纯。因此,阅读与鉴别史料需要穿越史料中所包含的多重主体隔障,以揭示其中所包含的客观性内容,从而达致历史阐释的共同性与公共性,也就是客观性。

这里所说的穿越主体隔障,既需要发挥认识的功能,也需要发挥理解的功能。只有在“认识”与“理解”的共同作用下,才有可能做到古人所说的“读书得间,心知其意”。而所谓客观性,在20世纪诸多哲学讨论中,已经不再单纯地指向“按事物的本来面貌表现事物”,而是指向“如何找到一些标准来评判那些宣称已按事物本来面貌表现事物的断言”^{[15](P167)}也就是说,要找出作为断言的史料当中所包含的共同性与公共性。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史料的共同性与公共性既具有历史性,也具有对当代的开放性。换言之,史料总是出现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却总是能够为后人所理解。总之,史料不仅是一个有待招供的犯人,还是一个目击的证人,尤其还是一个具有“断言”属性的判官。那么,作为“断言”,史

料的客观性何在?这就需要文献学意义上的史料鉴别,而文献学意义上的史料鉴别说到底则需要认识论的支撑。没有认识论支撑的史料鉴别即使在事实上做得通,在说服力上也是有缺陷的。

毫无疑问,任何“断言”都含有共同性与公共性。将这种共同性与公共性揭示出来,是历史学的基本职责。由于历史认识具有不可实验和对证的特性,所以海德格尔等人倾向于否定“断言”当中所蕴含的共同性与公共性,从而否定历史学的科学属性。在海德格尔看来,历史学是实验科学的现代对立形式。因此,历史学的本性注定了它“从未达到过历史”。^{[16](P178)}这样一来,他便把历史学置于了一个二律背反的悖论之中:要么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面对一个可实验的物理世界从而使自己不再是历史学,要么历史学像精神学科那样面对一个不可实验的人类世界从而使自己永远达不到历史。

其实,对于海德格尔的这个诘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有解答,且做过深入剖析。扩大地说,至少从新康德主义开始,就已经对精神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属性进行了深刻揭示,从而迫使这个世界不再一味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认知人文世界。但是,这不等于消弭了史料中所蕴含的历史的客观性,只是这种客观性不再像旧唯物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简单而已。

换言之,目前人们对史料的认知,既已不再基于直观反映论的前提与基础,但也没有否定史料中所蕴含的客观真实内容。而是认为,对史料客观性内容的检验,需要在共同性和公共性中去进行并得以实现。史料内容的客观性与历史阐释的公正性与妥当性,通过历时性的过程,在共同性与公共性的概念之下加以检验并被人们所认可。

当然,共同性和公共性也是历史性的,随历史而变动。后起史家的历史阐释,或以新方式证实先前已具公共性的历史阐释(如二重证据法),或以新阐释推翻先前原有公共性的历史阐释(如“古史辨”);“或指向新意指的涌现,或指向远古幻想的涌现”^{[17](P27)}。总之,处于历史流变当中的史料解读,是在“疑”“信”“证”的交互作用中形成合力,从而形成历史阐释及公共性理解的时代更迭。

这正是克罗齐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翻进之义。这里所说的“当代史”,我国学者的理解大都有误。它的真正含义就如柯林武德所说,不是指“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而是指“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12](P229)}因此,史料并没有变,但历史阐释却更新了。历史阐释的更新是在自身并不改变的共同的史料前提下,阐释立场、视角和手段的更新,是史家的自我更新。一篇优秀史学论文的创新性,往往在于其对史料的解读,而不在史料本身。发现与披露新史料,是史家的本分与本事,但毕竟只是历史学的基础性工作。

三、未来的史料之道

由上可知,史料并不天然地自然显现其全部信息,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是为了顺从史家的研究而编纂。它虽然“向所有能够阅读的人说话”,但在留下史料编纂者意图的同时却切断与编纂者的联系,从而使自身具备保罗·利科所谓“文本的语义学的自主性”^{[11](P184)}。那么,史料既具有如此特性,我们为后人留存史料,又当从中接受怎样的启示呢?

显然,必须为史料的未来读者预留阐释空间。展望未来,史家处理史料的困难,将不再体现在搜集上,也不会体现在数量不足上,而是体现在怎样阐释上。对史料的甄别、解读,特别是对于史料中蕴而未发的意义抉发,逼迫着历史阐释的介入。《春秋繁露·精华》:“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效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18](P60)}所谓“察”,即阐释。面对浩繁的史料,只有经过“察”,才能“知”与“明”。否则,史料再多,也只能“寂若无”。

事实上,史料的浩繁必然会导致垃圾史料的极度增长,从而造成对浩繁史料的熟视无睹。所以,史料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的形势与趋向,虽然能够改善却不会彻底消除旧史料原有的弊端。

关于旧史料所具有的弊端,梁启超做过极为详细而周密的阐述。他将所谓“旧史”亦即史料比喻为“儿童用残之旧课本”与“电影破片”,其基本特点就是“原文本已编辑不精,讹夺满纸;而复东缺一叶,西缺数行,油污墨渍,存字无几”;其中“若干段已完全失却,前后不相衔接;其存者亦罅漏模糊,不甚可辨”。但是,历史却只能依靠这些东西而流传下来,历史学家也只能依靠这些东西去传达历史。因此,在史料与史家需求之间,发生了错位与矛盾。这种错位与矛盾,主要源于当初编纂史料的目的与后世史家读取史料的目的不一致。后世史家认为“极可宝贵之史料”,在当初编纂史料的时候却被认为并不重要,因而遭到摈弃从而湮没。

类似这种今人很需要、古人却扔掉的史料,可谓数不胜数。对此,梁启超感慨良深地说:“吾侪今日乃如欲研究一燹余之芜城废殿,从瓦砾堆中搜集断椽破甍,东拼西补,以推测其本来规制之为何若。此种事业备极艰辛,犹且仅一部分有成功希望,一部分或竟无成功希望。”而且,即使就“向来公认为完全美备之史料”而言,其中错误与虚假的成分也“不知凡几”。因此,梁启超认为:“吾侪今日对于此等史迹,殆有一大部分须为之重新估价。”^{[19](P284)}

显然,梁启超的论述不仅具有文献学与史料学价值,更具有历史认识论的蕴含。与旧史料的情形相比,未来的史料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说,未来史家所面对的将不再是“瓦砾堆”中的“断椽破甍”,而是日益趋近的“完全美备之史料”。那么,这种情况的日益趋近是否就单纯意味着美事一件呢?事情恐怕未必如此简单。由此,我们就不能不想到今人应该怎样留存史料的问题。

不妨试想一下:将来的人们是否会对今日我们的史料留存工作满意?今日留存史料的目的是否会与未来人们对史料的需求发生错位与矛盾?对此,不能不作深长之思,因而也就不能不对当代史料存留制度构建工作予以高度关注与研究。这其中包括:史料存留的规范到底是什么?在各种资料大堆积、大膨胀与大爆炸的情形下应该怎样重新考虑史料留存的意义、方法、标准?总之,后人希望我们今日为他们留下怎样的史料、怎样留存史料?

今天到底应该怎样为后人留存史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在理论上尚未得到认真检视的问题。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越来越被广泛应用的背景下,这类问题与其说能够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毋宁说它正是科技时代的产物。科技在为人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必然为人类带来新的麻烦。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历史研究也无从脱离辩证法的制约。我们将会看到,未来史家在史料方面所遇到的麻烦,绝不会比先前的史家少。但是,新麻烦的属性和特征会发生变化。

让我们再回到旧史料的情形。梁启超说:“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滔滔代逝。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吾侪所需求之百一也。其幸而存者,又散在各种遗器、遗籍中,东鳞西爪,不易寻觅。即偶寻得一二,而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则或费莫大之勤劳而无所获。其普通公认之史料又或误或伪,非经别裁审定,不堪引用。”^{[19](P287)}传统史学所遭遇的这种情况,未来史学无疑会大量减少。无论数量上的“少”,还是分布上的“散”,抑或搜集上的“难”,以至荟萃上的“苦”,都会大大改善。特别是由于科技手段的应用,“荟萃比观”“别裁审定”的工作将变得容易。总之,未来史学所面对的问题将不再体现在史料匮乏与难于寻获上,却会体现在过于繁多与不易挑选上,由此而产生新的问题。

这就是梁启超所揭示的另一类情形,即:“斯学所函范围太广,各人观察点不同,虽有极佳良现存之史料,苟求之不以其道,或竟熟视无睹也。”^{[19](P287-288)}换言之,未来史学的困窘之处,不是在“搜集资料”或“选择资料”方面搜无可搜、选无可选,而是搜不胜搜、选不胜选。由于史料数量的极

度膨胀,史家不仅终生无从应付,而且即使依靠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很可能在大量碎片化、垃圾化、平面化、同质化的史料面前无从判断。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知梁启超所发出的预警,也就是必须预先考虑怎样“以其道”“求之”的问题。“苟求之不以其道,或竟熟视无睹”,其所导致的后果必将是技术的全盘宰制,从而是史家主体性的全面丧失。那个时候,史家将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将全部是程序操作员。

因此,“儿童用残之旧课本”或“电影破片”式的旧史料固然问题多多,但“范围太广”“观察点不同”的新史料却麻烦更多。“儿童用残之旧课本”或“电影破片”的史料残缺性非但不会因为史料大膨胀而消失,而且还会与另一种极端性情形相互配合,向史家提出更严重的挑战。在多不胜数、数不胜数的史料面前,当史家去提取真正需要的史料时,却只能如《史记》中黄生所谓“冠虽敝,必加于首”^[20](卷一十二《儒林列传》, P3123),亦即所寻获的依然是“儿童用残之旧课本”或“电影破片”。因此,面对未来,究竟应该怎样留存史料、应该怎样使用史料,绝不可“熟视无睹”,必须“以道求之”。

所谓“道”,笔者认为只能在“阐释”二字中寻之。今后的历史阐释,必然会时而在残破而狭窄的史料通道中,时而在华丽而臃肿的史料殿堂中交叉穿梭前行。因此,既不偏离史料约束,又不被史料淹没,会成为对史家的严峻考验。当偏离史料约束时,会发生游谈无根的“过度阐释”,亦即对历史对象的强制附加。当被史料淹没时,会发生死在句下的文本獭祭。二者相反,却均不在创新之列。所谓史学创新,是指“在过去中重新发现最好的东西”。它是“发现”而非“发明”,因此既不允许偏离历史对象,也不允许六经注我。史料越来越多,新发现却越来越难;人人使用科技手段,个性化成果却越来越少。在同质化的技术趋同驱使下,如何在对历史的完全尊重中表现历史真实,如何在人人皆可见的前提下见人所未见,不懂阐释之道,将无以成办。

总之,由于极度增长,史料的整体性、形态性改变,史学家的主要工作将必然从搜集史料向历史阐释上转移。同时,传统的史料解读工作,也会发生属性上的变化。比如阅读史料,就不再会被单纯视为与历史的照面形式,而是被视为史实的一种新的实现方式。海量的史料信息,将促使史家由深细的史料辨析转移到剔除垃圾史料上来,从而将被遮蔽的历史本质突显出来。总之,史家的思想能动性、积极性将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在同质化的海量信息中“重构”史实将成为史学的主流形态。倘非如此,在海量的史料面前,史家或者会无所适从,或者会徒劳无功。

因此,剔除史料而非搜集史料,将成为今后史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在海量的史料中突显出历史的本质,才能适应未来史学的发展形势。重构对于宇宙中任何有理智的存在物的行为来说都具有本质意义,但历史学家的重构行为却只能在史料的范围内来进行。由于史料形态的改变,史家的重构行为方式也会改变。它没有切断与以往历史学的关联,但偏重点转移了。由于偏重点的转移,传统的史料学、文献学乃至考证或考据学都会变化。传统的考据学家会变得越来越无事可做,因为考据当中那些严密的搜证程序将由机器代替。所有史料都会被储存在科技产品之中,对它的调取将体现为启动操作。反之,只有对它的独家阐释成果,才是机器检索不到的。

由此出发,阐释的明见性与晦暗性都会增加。“哪里先有错误解释,哪里便有解释学。”^[17]^[20]随着错误阐释的增加,人们对新证据的搜求也会增加,因而对无用史料的剔除任务也就愈加繁重。新证据之所以能够在更高程度的概然性上指向历史真实,就在于对无用史料的剔除工作做得彻底。这样一来,考据的属性与特征亦随之而变。

传统考据的特点在于稀有史料的互证,未来考据的特点则在于众多史料的去蔽。考据以历史真实的客观存在为预设,目的在于让史实重见天日。但是,史实的缺失在以往主要体现为史料的缺失,在将来则主要体现为史料的遮蔽。史料太多同样会遮蔽本质性的历史真实,这是史料问题

上所体现出来的辩证法。由于史料的日益充分化与可靠化,历史现象被遮蔽的可能性只会日益减少,但历史本质被遮蔽的问题却会增加。随着传统考据学的式微,新的考据学会逐渐生成。这种新的考据学一方面要剔除无用史料,另一方面则要对错误阐释予以辨析。随着史家对历史意义阐释不断增加的歧异化与多样化,历史考据的思想性也会不断增加。因此,考据学会越来越带有思想考据的属性。

同样由于史料的充分化与可靠化,史学对象的确定性与固定性增加,因之对于史家研究视角转化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对过去的意义的阐释会越来越多。历史学的生命力将越来越体现在对历史意义的阐释而非对史料的搜集上。可以预言,缺乏思想的历史学家会越来越没有前途。

众所周知,古代史研究常常苦于史料太少,近现代与当代史研究则苦于史料太多。展望未来,苦于资料太少的情况固然不会改变,但经由新出文献与跨学科研究,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领域依然会风光无限。唯有当代史研究,资料原本就过多(却又常常不可得见),从而使得甄别工作的地位日益突显。怎样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甄别出最有价值和意义的精品,固然需要分工的介入,但理论上的澄明却不可或缺。反过来说,如何为后人留存史料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这个问题的实际存在,对世界各国的当代史研究者或未来史学研究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可以这样说,当今世界的史料存留意识已达空前强烈的程度;各国无不将留存史料视为国家制度。然而,什么东西值得留下,什么东西不值得留下,并未达成共识,更无统一做法。目前人们所持的基本态度,总体上是“捡到篮里便是菜”,亦即尽可能把什么东西都留下。但是,一旦到篮子里拿菜,却未必拿得到。因此,多而无用成为当代史料的基本状态。

在国外,保罗·利科已经提出“从口头见证到文字见证,到档案文献的转变对于活生生的记忆而言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到底是毒药还是良药”的问题。也就是说,史料的大爆炸、大增长、大膨胀,对人类记忆而言到底有利还是有害,并非不是一个问题。对此,亟须在理论上“通过将怀疑形成的条件揭示出来”,从而去“接近见证的意义核心”。^{[11](P210,220)}也就是说,先把问题摆一摆,然后再去寻求通透答案。此类想法当然不是杞人忧天,也非痴人说梦,而是科技时代的现实。

四、结语

19世纪以来,随着历史学在欧洲成为一门正式学科,人们对史料的观念也随之改变。由希罗德多德所开创的重旅行采访、轻文献征引的史料搜证方式,转而为查询档案资料所代替,古物学与历史学一向分裂的格局被打破,从而形成了今日被绝大部分史家所采用的史料处理方式。在我国,由于晚清“新史学”的倡导与推动,“写民史”“去君史”的思潮一时兴起,从而彻底改变了王朝史料独尊的史料搜集理念。入民国后,一方面由于史料观念的改变,一方面由于新出文献的推动,历史研究的整体格局随之丕变。显而易见,“观念更新”与“新出文献”是推动史学进步的两大动力。在这两大动力驱动下,既出现了许多以往很少关注的研究课题,也出现了以往从未有过的历史书写方式。与之相伴,关于史料的理论研究也展现出新局面。但总体看,史料研究依旧局限在史料学与文献学的范围内,尚未达致历史认识论的高度。

本文开篇即言,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但是,历史学并不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实证科学。依赖史料、注重实证不等于就是实证主义。事实上,史料的主观性,比如对时间单位与空间单位的特定运用、特定话语与修辞的采用等,都非实证主义所能回答。因此,史料研究亟须跳出旧的格局,向历史认识论的方向靠拢。只有如此,才能适应AI时代。

注释:

①关于阐释、诠释、解释的关系,参见拙文《阐释·诠释·解释·说明》(《浙江学刊》2023年第6期)。

[参考文献]

- [1](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3](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宗教生活现象学[M].欧东明,张振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4](德)恩斯特·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M].赵海萍,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
- [5](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M].杜玉生,卢华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 [6](德)伽达默尔.在现象学和辩证法之间[A].洪汉鼎.伽达默尔著作集: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7](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时间概念史导论[M].欧东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8]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A].欧阳哲生.傅斯年文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7.
- [9]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10]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1](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M].李彦岑,陈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12](英)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13](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14](英)F.H.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M].何兆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15](美)阿兰·梅吉尔.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M].黄红霞,赵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16](德)马丁·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17](法)保罗·利科.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集[M].莫伟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18](汉)董仲舒.春秋繁露[M].周桂钿,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A].汤志钧,汤仁泽.梁启超全集:第11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20](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俞 晖】

ABSTRACTS

(1) Historical Material Issue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Li Hongyan

The empirical nature of histor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its dependence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re is no historiography without historical data. Historical research is subject to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historical sources. Historical sources not only limit the recurrence of history, but also allow the reappearance of history that has passed. Historians open up the real historical world through th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positioning and conceptualizing them, filling in information in reverse, mak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clear, and achieving the reenactment of historical scenes. Historical materials constitutes the first step in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y.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s firstly embodied in the stage of historical data interpret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revealing the commonality and public nature inherent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Looking ahead, the vast number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will lead to an extreme growth in irrelevant and useless historical materials, posing a realistic challenge for historians in preserving record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find ways to preserve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e future.

(2) Humanistic Studies and Explorations in Confucian Classics

Yang Guorong

How to coordinate the explor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with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humanities is the first problem that academic institutions faced with, which encompasses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but focuses on Confucian classics. In terms of 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it further delve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forms of Confucianism and its modern construction.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not only to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but also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into a modern form, as stagnating in history hinders new achiev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cific research approach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thought, or the integration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is also a noteworthy aspect. This is closely tied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latter lies in shaping a global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thought, transcen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constitute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reflected in humanistic studies.

(3) The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of Cyber Viol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ctim Protection

Ouyang Benqi

The denotation of cyber violence in China should not be too broad. The legal interests infringed by